



官场,他表示不愿在官场空谈,而更愿意作些编纂小学教科书的实事。

在南洋公学译书院期间,张元济除了按照盛宣怀制定的“以练兵为急务”的指导思想,大量翻印兵书之外,还亲自筹划翻印了一批近代西方重要的政治、法律、商务等方面的著作,并聘请著名翻译家严复担任译书院总校。截至1901年7月,译书院已译出外文书籍31种,出版14种,涵盖历史、文化、法律、政治、经济等方面,大部分译作在社会上都有很好的反响,其中引起轰动最大的当属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原著、严复翻译的《原富》。此后,南洋公学总理何梅生病逝,张元济接任该职。1901年,张亲拟章程,开设特班,并邀请蔡元培担任总教习,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不乏日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如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谢无量等。

二、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的开创性工作

在南洋公学任职的三年,思考维新变法的教训和兴学育才的得失,张元济的思想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1902年3月,他在上海《教育世界》杂志第20号上发表《答友人文学堂事书》,便是其痛定思痛之后的写照。他讲:“非谓学堂不足以育才,然念念在育才,则所操者狭而所及者浅……今设学堂,当以使人明白第一义。德被法败,日本维新,均汲汲于教育之普及者。”所以,必须做到“无良无贱,无智无愚,无长无少,无城无乡,无不在教育之列也。”欲达此目的,必须重视普通和初级教育,这样才能像西方那样“民智大开”。正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同年,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一生与出版结缘。在与商务相伴的半个多世纪中,他编写教科书、办杂志、翻译国外名著、影印校勘古典文献、编写辞书、创立图书馆,还培养了一大批近代知名的出版人,可谓功名卓著。可以说,张元济成就了商务,商务也成就了张元济。

到任商务后,张元济随即着手编辑教科书以“扶助教育”。他与蒋维乔、庄俞、杜亚泉等反复研究已有的各种“课本专书”的优缺点,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最新国文教科书”的编纂原则。据蒋维乔回忆,这一过程“略似圆桌会议,由任何人提出一原则,共认有讨论之价值者,彼此详悉辩论,恒有为一原则讨论至半日或终日决定者。……所发明之原则,涉及儿童启蒙的特点,如何由简入繁,由

少而多,循序渐进,增加兴趣,综合发展等等。”整个编纂过程,参与诸君“合坐一室中,每成一课,轮流阅读,或加润色,或竟改作,相互为之,毫无成见。”经过近半年的努力,“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始告编成,后又由张元济、高梦旦、长尾慎太郎等人“详加校订”,并于1904年3月正式出版。此书上市后仅数日,初版4000册即告售罄。此后,张元济等人又陆续变成了一整套初等、高等小学教科书,共16种78册,风行全国,同业竞相效仿。与此同时,张元济还组织出版了“帝国丛书”,其中包括《明治政党小史》、《埃及近代史》、《帝国主义》、《各国宪法略》等。1903年起,又陆续出版“政学丛书”、“财政丛书”、“商业丛书”、“地学丛书”、“战史丛书”等一系列的丛书,以及《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等刊物,为新知、新学的普及传播波助澜。除此之外,张元济对西方名著的翻译出版青睐有加,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为当时其他书局所不及。其中以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的影响最大,不胫而走,思想界耳目为之一新,这些图书、杂志在当时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和出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三、张元济在近代图书出版事业上绽放的成就

张元济提倡“西学”,并不排斥“中学”。有感于清末以来中华典籍毁于战火和大量流失,决心要精校、影印一批有用的古籍,借以保存祖国文化遗产,服务于学术界和社会大众。在他亲自策划下,1916年商务出版了《涵芬楼秘笈》,1919年编印《四部丛刊》初

张元济,字菊生,号甯斋,浙江海盐人,生于清同治六年(1876),1959年在上海逝世,中国近代著名出版家、版本目录学家,商务印书馆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张元济自幼便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光绪壬辰(1892)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刑部贵州司主事、总理衙门章京等,后来因为参与戊戌变法被革职,并“永不叙用”。1898年,张元济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很快被聘为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院长,后来接任总理。但是由于与当时南洋公学的监督福开森在办学方针上的意见不合,难于共事,不久便辞职了。1902年,张元济应商务印书馆馆长夏瑞芳之邀来到商务印书馆工作,负责商务的日常业务,曾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一生与商务结下不解之缘。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委员等职。

张元济一生致力于改良社会、振兴中华,无论是从政、办教育,还是做出版工作,伴随他的始终是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和对于民族、国家的拳拳赤子之心。

一、张元济图书出版事业的起步

张元济是比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中国士人,年轻时便“略识洋文”,后来还跟随爱尔兰医生柯大夫学习英语,于是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民主思想和政治学说,思想开放,并积极参与维新派的相关活动,与强学会的很多人都保持密切的往来。当时维新派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废科举、兴学堂,培养新式人才。1896年,他与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经等人集资兴办“西学堂”,次年正式开馆,并奉旨改称“通艺学堂”,讲授英语、数学,培养翻译人才,积极支持康梁的变法维新活动。通艺学堂是张元济全身心实践其救亡图存目标的第一个阵地,从募集资金、聘请教习、添置图书设备,到外出参观访问、拟奏递呈等,无不躬行。对此,他曾说道:“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望,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戊戌变法期间,他曾多次上书建议实行政治改革,然而变法很快以失败告终。戊戌后,认识到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非常顽固,想要通过学习效法西方就一夕改变所有,实非易事。但他深信只要启迪民智,就会有很多人接踵而至,后来汪康年曾劝说他重新加入

近现代教育家马叙伦 教育思想探析

□ 金淑娟 胥英明



马叙伦是我国近现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号寒香（又作石翁），字彝初，浙江杭州人。早在清朝末年，马叙伦就投入到了教育实践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在民国时期，马叙伦三次出任教育部次长，四次在北京大学任教，领导

任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是现代中国教育事业的领导者和奠基人，在民国担任教育次长，新中国担任教育部部长、高等教育部部长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变革性的教育思想。在民国时期提出了教育宗旨思想、整顿教育思想以及高等教育改进思想。在担任新中国教育部部长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高等教育思想，推动了我国近现代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一、马叙伦的基础教育改革思想

马叙伦在 1922 年 1 月在北京做实际教育调查，回浙江之后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主张，引起了当时教育界人士强大的反响。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教育改革主张。

1. 成立教育调查机关，改革教育检查制度。马叙伦广泛研究了西方各国的教育调查制度，指出：西方各国的教育调查往往是由几十位教育专家组成教育调查团体组织，需

教师和学生多次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担

要获得专门的教育调查经费，经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调查，才能分类写成教育调查报告书。因此，他认为我国要是由一个教育团体在全国作调查效率不高，存在很大的难处，因此不如分省组织教育调查团体，成立教育调查基金，指定教育调查方法，分省作实地考察。他强调教育调查报告必须是调查者亲自撰写，不可假手他人。这种调查方法可以很快掌握全国的教育情况。

马叙伦指出，民国时期的教育检查机关变成了“吃饭机关”，是养老过渡的职位，腐败现象严重，没有发挥它本身应该具有的作用^{[1][2]}。因此马叙伦提出了七项改革教育检查制度的措施。第一，修正调查规程；第二，制定详细的检察事务细则；第三，禁止伪造检查报告；第四，严格调查人才选拔；第五，检查报告必须详细记录各种教育实际情况；第六，每年将检查报告装订成册，送给教育专家做研究；第七，应该分科目做教育检查。马叙伦针对民国时期的教育调查制度和教育检查制度的弊端，在借鉴西方国家的相关制度上提出了适合民国时期国情教育改革制度，有利于我国近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2. 提高小学教师素质，改革中等教育制

度，1930 年开始出版《百衲本二十四史》193 年和 1935 年《四部丛刊》续编、三编又陆续印行。此外，《续古逸丛书》、《正统道藏》等珍贵古籍，经过张元济多年的不懈努力也先后得以影印出版。商务影印书的出版，嘉惠学林，人们无不称快。

编写辞书是张元济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又一大贡献，正式得益于他对辞书出版的持续关注，商务印书馆在 20 世纪逐渐成为了我国辞书出版事业的重镇。早在 1901 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我国第一部双解英语词典——《华英音韵字典集成》时，尚未入馆的张元济就对此创举颇为赞赏，并主动代邀严复为其作序。执掌编译所后，他一直专注于这一领域的开拓，尽管编纂和出版双语辞书被认为是“事烦而益寡”的“甚难”之事，但张元济坚信“凡欲知一国之典章制度，必熟谙其国之文字语言，而后能触类旁通”。以英汉辞书的出版为例，如 1908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英华大辞典》，为编此书，张元济专门延聘执教于上海圣约翰书院的颜惠庆主持，三易寒暑，终成全稿。又如商务 1929 年编印的《英汉模范字典》，至 1935 年已重印了 34 次。在汉语辞书的出版方面，张元济也同样倾注了大量精力。民初问世的《商务印书馆

新字典》和《辞源》，就是他会同商务国文部同人共同编就的力作，这两部工具书的出版结束了《康熙字典》支配辞书界 200 多年的历史，标志着汉语辞书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此外，在张元济的支持下，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一系列重要辞书。

出于编辑出版工作的需要，商务印书馆于 1909 年设立了第一个图书馆，命名“涵芬楼”，所藏不仅用作编译所的参考资料以保证编书的质量，并可以充当影印古籍的底本，以开辟商务的古籍影印出版业务。更重要的是，创立并悉心经营涵芬楼，饱含着张元济身处乱世，对挽救千年中华文化的责任和使命。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涵芬楼藏书“虽未可谓集大成，而图书馆之规模略具矣”。1924 年 4 月，商务印书馆在宝山路公司对面新建的五层高楼竣工，将涵芬楼藏书迁入，取名“东方图书馆”。馆藏不仅有中国的善本古籍，还有大量的新书和外文书刊，尤以教科书最多最全，并于 1925 年对外开放，以供众览。据统计，至“一·二八”事变前，东方图书馆实藏：普通中文书 268000 余册，外文书 80000 余册，图表、照片 5000 余种，四部各版本善本古籍 3745 种、35083 册；全国凡 22

省省志 2641 种、25682 册，全国府、厅、州、县志 1753 种，中外杂志、报章亦较完备；另有新购进的扬州何氏藏书 40000 余册。毫无疑问，当时该馆的馆藏在全国可谓首屈一指，不幸的是，这些藏书，连同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编译所在 1932 年 1 月 29 日被日本侵略者付之一炬，很多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从此绝迹，实乃中国出版史上的巨大损失，令人叹息。

八年抗战，张元济蛰居上海。但他依然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关注着他付出一生的出版事业。他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讲述了我国古代 14 个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故事，提倡中华民族应有的人格，联合他人发起成立了合众图书馆，搜集、保存古籍善本，为散佚的中国典籍营造了一个归宿。新中国成立时，最终完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本书——《涵芬楼烬余书录》。张元济先生的一生是孜孜以求的一生。他之于中国近代出版事业，是拓荒者，是奠基人，是践行者，无愧为我们心中一座永远不朽的丰碑。

参考文献

- [1]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M].中华书局,1957.
 - [2]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M].商务印书馆,1992.
 - [3]宋原放.中国出版史[M].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
 - [4]吉少青.中国出版简史[M].学林出版社,1991.
- ★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图书馆。